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基于10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调查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town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Under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urvey of 10 Provinces with Large Amount Output of Workforce

唐 杰 著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基于10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调查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town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Under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urvey of 10 Provinces with Large Amount Output of Workforce

唐 杰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唐杰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96-3340-3

I. ①统… II. ①唐… III. ①民工—劳动就业—研究—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6833 号

组稿编辑: 宋 娜
责任编辑: 宋 娜 丁慧敏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陈 颖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3340-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一) 编委会

主 任：李 扬 王晓初

副主任：晋保平 张冠梓 孙建立 夏文峰

秘书长：朝 克 吴剑英 邱春雷 胡 滨 (执行)

成 员 (按姓氏笔划排序)：

卜宪群	王 巍	王利明	王灵桂	王国刚	王建朗	厉 声
朱光磊	刘 伟	杨 光	杨 忠	李 平	李 林	李 周
李 薇	李汉林	李向阳	李培林	吴玉章	吴振武	吴恩远
张世贤	张宇燕	张伯里	张昌东	张顺洪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陈春声	卓新平	罗卫东	金 碚	周 弘	周五一
郑秉文	房 宁	赵天晓	赵剑英	高培勇	黄 平	曹卫东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谢红星	谢寿光	谢维和	蔡 昉
蔡文兰	裴长洪	潘家华				

(二) 编辑部

主 任：张国春 刘连军 薛增朝 李晓琳

副主任：宋 娜 卢小生 姚冬梅

成 员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宇	吕志成	刘丹华	孙大伟	曲建君	陈 颖	曹 靖
薛万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9CJY061）成果

本成果得到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专项经费的资助

序 一

博士后制度是 19 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酿实施博士后制度。1985 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1992 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 2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短短 20 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

伟大创造。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功不可没。

值此中国实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 20 周年之际，为了充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进一步发展，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反复磋商，并征求了多家设站单位的意见，决定推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一个集中、系统、全面展示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的学术平台，《文库》将成为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学术风采、扩大博士后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园地，成为调动广大博士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加速器，成为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领军人才的孵化器。

创新、影响和规范，是《文库》的基本追求。

我们提倡创新，首先就是要求，入选的著作应能提供经过严密论证的新结论，或者提供有助于对所述论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思路。与当前社会上一些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要求不同，我们不提倡在一部著作中提出多少观点，一般地，我们甚至也不追求观点之“新”。我们需要的是有翔实的资料支撑，经过科学论证，而且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论点。对于那些缺少严格的前提设定，没有充分的资料支撑，缺乏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仅仅凭借少数来路模糊的资料和数据，便一下子导出几个很“强”的结论的论著，我们概不收录。因为，在我们看来，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

我们提倡创新，还表现在研究方法之新上。这里所说的方法，显然不是指那种在时下的课题论证书中常见的老调重弹，诸如“历史与逻辑并重”、“演绎与归纳统一”之类；也不是我们在很多论文中见到的那种敷衍塞责的表述，诸如“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统

一”等等。我们所说的方法，就理论研究而论，指的是在某一研究领域确定或建立基本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推论及其检验；就应用研究而言，则指的是根据某一理论假设，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目标，所使用的具体模型、技术、工具或程序。众所周知，在方法上求新如同在理论上创新一样，殊非易事。因此，我们亦不强求提出全新的理论方法，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要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来展开研究并构造论著。

我们支持那些有影响力的著述入选。这里说的影响力，既包括学术影响力，也包括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就学术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达到公认的学科高水平，要在本学科领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若干年后仍然能够为学者引用或参考。就社会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能向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进程转化。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一个转化问题。其研究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向现实政策转化，要向和谐社会建设转化，要向文化产业转化，要向人才培养转化。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想发挥巨大影响，就要瞄准国际一流水平，站在学术高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尊奉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我们强调恪守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坚决抵制各种学术不端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当此学术界世风日下之时，我们希望本《文库》能通过自己良好的学术形象，为整肃不良学风贡献力量。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序 二

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已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

培养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更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国家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切实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力争在当代世界思想与学术的舞台上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地位。

在培养和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战略与实践上，博士后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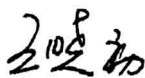
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下，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开始实施的。这也是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我国已建立了科学、完备的博士后制度体系，同时，形成了培养和使用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政府调控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服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通过实施博士后制度，我国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他们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依托自身优势和兴趣，自主从事开拓性、创新性研究工作，从而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突出的研究能力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其中，一些出站博士后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在“长江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人才梯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可以说，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国家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拔尖人才的重要途径，而且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造就了一支新的生力军。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博士后的优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但往往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这些成果不能尽快问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现实作用，着实令人痛惜。

可喜的是，今天我们在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研究成果出版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科研成果，并为其提供出版资助。这一举措不仅在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上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而且有益于提升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的学术地位，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有益于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今天，借《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出版之际，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与机构能够了解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博士后及其研究成果，积极支持博士后工作。可以预见，我国的博士后事业也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摘 要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其个人及家庭的流动，也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就业岗位，更能带动资金、技术、信息以及价值观念由城市向农村流动，并促进乡村社会力量的发育。因此，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实践，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融合意义重大，并且有助于创新和发展“迁移”理论和中国城乡发展理论建构，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书先剖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与理念、核心战略及实施路径，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系，厘清了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证研究的重点。

随后，基于对 10 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调查，笔者结合创业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能力和意愿，深入了解作为创业主体或潜在创业主体的农民工的经济社会生活、思想状况与创业意愿，考察其创业所需资源禀赋的拥有情况，以及影响其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大量实地访谈资料，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过程与各地扶持政策的实施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了以下主要发现和观点：

第一，返乡农民工在资金、技术、信息等创业资源的占有方面总体上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同时面临知识与能力的不足，且缺乏创业所需的“理性”，创业能力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返乡农民工内部分化日益明显，一部分人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技术、资金、信息和人脉，而且在底层、边缘的社会生活中磨炼出了创业所需的“韧性”。

第二，与这种客观的创业能力较弱相比，返乡农民工群体主观上的创业意愿却要强烈得多。相对年轻、现代性水平较高、有配偶的农民工更具有返乡创业倾向。同时，自认为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显著高于自认为经济状况处于相对高水平的个体。另外，是否享受当地政府对返乡农民工的扶持政策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并无显著关系，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贡献十分有限。

第三，农民工创业实践呈现若干共性特征。从动机上看，农民工创业以生存型创业为主，但是机会型创业总量亦在增大；从路径上看，农民工创业以经验型创业为主，总体上对资本和政策的驾驭意识及能力相对较弱；从行业分布上看，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种养殖、辅助性加工制造和生活性服务业。同时，创业农民工的特征与高创业意愿农民工群体特征保持了一致性。但是，那些获得较大成功的，尤其是机会型创业的农民工群体，相对而言年龄更大，而且往往具有相对稳定的婚姻和明显较高的市民化水平。另外，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中能人经济和“专制”色彩明显，极少以“团队”为主体开始创业。

第四，统筹城乡发展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存在促进作用，也形成了排挤效应。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增长，优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创业环境，使得价值情感和社会网络对创业农民工的拉力增大。而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创造了一个“调整期”，使许多创业者注意到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的优化，并且更加理性地考虑创业阵地的选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也使得大规模资本在政府支持下进入乡村，挤压了农民工创业的空间和资源。

第五，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体系完善、实效较差，原因复杂。农民工创业培训、税费优惠、贷款支持等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常常脱离或者超越农民工创业的实际需求，且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对于创业促进和新兴企业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原因在于，国家更加重视“稳定”层面的问题，在扶持农民工创业等“发展”层面的政策上常常缺乏具体目标和落实路径指导，政策统筹层次较低，基层政府落实政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由于农民工创业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贡献甚微，基层政府常常习惯性地采用“树立典型+加强宣传”的策略来落实相关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新型传媒发展迅速并逐渐普及的情况下，这种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六，从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和理念来看，当前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常常是不公平的，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暗含风险的秩序认同，且大多数政策不具备可持续性，有些已经被终止，有些则被纳入其他政策或者成为其他政策的附属政策。

基于这些认知，笔者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构建了一个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体系，具体内容包括：①建设两大操作平台：返乡农民工创业潜质评价系统，创业项目评价系统。②抓好四大重点领域：创业资金与金融支持；学校创业教育；创业服务；鼓励合作型创业。③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主动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与国家人才政策等对接，弥补农民工创业“短板”。④建设两大基础工程：同源化人口综合跟踪管理信息系统、个人综合信用管理系统。

关键词：返乡创业 农民工创业 农民工回流 统筹城乡发展

Abstract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town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is not only a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but also increas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ransferring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bringing flows of capit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values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forces. Therefore, supporti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s a concrete practice and a starting point of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nce this is important to rural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s helpful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theory as well a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study is significant prac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This book analyzes goal, concept, core strategy and implement path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esen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at, the book discusse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home business by returning-home migrant workers, clarifying the key point of current empirical study upon this group.

Subsequently, based on a survey of 10 provinces with large amount output of workforce, the author, combi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venture, analyzes the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delves in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ideological status and entrepreneurial will of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the (pote-

ntial) main body of venture, and investigates into their ownership of resources required and key factors which may affect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using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interviews,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practices of returning-hom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orting policies,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and then forms the following major findings and views:

First, returning-home migrant workers are in a relatively vulnerable position in capit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other resources on venture, and because of a lack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required “rational”, their entrepreneurship is generally in a lower level. Meanwhile,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migrant workers is increasing, with some people who have accumulated a certain amount of technology,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cquiring “toughness” required in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a bottom and marginal social life experience.

Second, compared to their relatively weaker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home-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have a much stronger willingness towards entrepreneurship, especially those workers with younger age, higher level of modernity and spouses. Meanwhile, migrant workers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in a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towards venture than those individuals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at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status. Also,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supports of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indicating these policies’ contribution is rather limited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Third,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share certain features in comm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most migrant workers start a business in order to survive, while the amount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is also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 most entrepreneurship are experience-based and migrant

workers' overall awareness and capacity of mastering capital and policy are relatively wea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planting, aquaculture, auxiliary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are the main fields of the home-returning business. Besides, migrant workers who really start a business and those who have a strong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have a consistency i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ose who gain a success, especially in an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re more likely to be those with an elder age, a more stable marriage and a higher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In addition, far from relying on teamwork or collaboration,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home-returning business is hotshots-oriented and even authoritarian.

Fourth,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s both promotional and crowing-out effects upon home-returning bus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On one hand, through the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vestment in basic industries and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optimizing local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attracting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 by emotional value and social network. Also,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hich created an "adjustment period", more entrepreneurs started to concern the improv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became more rational in location selection, thus promoting a lot to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home busines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government-supported massive capital inflow towards rural area is actually squeezing the space and resources needed i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Fifth, complex reasons lead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ng policies (though seemingly comprehensive) for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ing policies such as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ax privilege and preferential loan usually go beyond the actual needs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due to certain